

文艺成都书系



王兴国 主编



中國旅游出版社



书法成都

王兴国 主编

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品

项目策划：王 颖  
责任编辑：吴慧慧  
责任印制：闫立中  
装帧设计：中文天地

成都散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成都 / 王兴国主编. — 北京 :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6. 5  
(文艺成都)  
ISBN 978-7-5032-5525-0

I. ①书… II. ①王…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1029号

---

书 名：书法成都

---

顾 问：舒 炯 向 黄 魏学峰 李兴辉

主 编：王兴国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mailto:cttp@cnta.gov.cn)

营销中心电话：010-85166503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金吉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10.5

字 数：88千

定 价：39.80元

I S B N 978-7-5032-5525-0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 第一辑：历史文脉篇

——成都历代书法碑刻 001

---

## 第二辑：名胜书迹篇

——成都名胜古迹书法 019

---

武侯祠的书法 022

杜甫草堂的书法 028

大慈寺的书法 038

宝光寺的书法 040

望江楼的书法 042

新都桂湖的书法 044

青城山的书法 046

## 第三辑：名人遗作篇

——成都历代名人书法 051

---

古代部分 054

近代部分 072

现代部分（1949～2010年） 098

## 第四辑：当代名家篇

——成都当代名家书法 143

---

后 记 165

第一辑：历史文脉篇

——成都历代书法碑刻



成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城址和名字 2500 年一直未变的古老城市。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秦汉以来成都即为大都市；西汉时期，成都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隋唐时期，成都为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煌）之第三；三国刘备、西晋李雄、东晋李寿、五代前后蜀等封建王朝都曾建都成都；元代以来，成都一直为四川治所（省会）。根据成都市内“金沙遗址”考证，成都的文明史至少已有 4500 年。

成都的艺术资源非常丰富。蜀锦、漆器、三星堆铜器和茶文化都是成都历史上引以为骄傲的艺术源流；唐代成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北宋年间发行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公元前 141 年，成都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文翁石室”；后蜀主孟昶在成都亲笔书写下中国第一副春联；成都画家黄筌、黄居寀父子所开创的“西蜀画派”（工笔花鸟画）影响了中国绘画上千年……

成都的书法同样具有非常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这里有灿若星辰的书法家，有众多的书法遗迹。秦汉以来，成都便不断诞生和发现书法石碑石刻，历代文化名人和书法名家的书法手迹，镌刻保存在众多名胜古迹中的书法牌匾、楹联、碑刻，活跃在近当代中国书法史上的众多书法名家等。数不清的成都书法名家和名迹，共同汇成了成都文化史上的书法艺术长河，展示了成都这座历史名城丰厚的艺术成果、人文气息和艺术气息，构建起了“书法成都”的这座艺术丰碑。

成都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这里曾诞生和汇聚过众多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卓著的名家大师，如司马相如、扬雄、贾谊、卓文君、黄筌、黄休复、常璩、杨慎、李颀人、巴金、艾芜等，都是古今中外有名、世人皆知的成都籍文学家、书画家和艺术理论家；李白、杜甫、王勃、高适、岑参、李商隐等都曾寓居成都。唐代安史之乱后，全国书画家曾纷纷入蜀，韦偃、孙位、滕昌祐、贯休等都曾在成都活动，成都成为全国的艺术之都。抗战时期，成都更是广纳四海俊杰，郭沫若、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陈子庄、赵蕴玉等都汇聚成都从事艺术活动，成都成为全国一时之艺术中心。

成都书法的历史文脉，我们大约可以从汉代说起。

从考古角度来说，成都乃至四川地区的书法情况，我们不妨先说说巴蜀文字的源头。目前在四川出土最早的带有文字符号性质的文物当数 1921 年在成都北郊白马寺、坛君庙一带出土的一批古铜器。有学者认为，这是有关“巴蜀符号”（文字）的第一批文物，其中包括一些刻有符号的铜戈和印章，上有三百余个符号（文字）。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古蜀开明王朝（距今约 4000 年）的文字，有的则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虽然看法不同，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巴蜀地区有自己的文字。由于和已经确认的中华民族汉字之源头的甲骨文体系不同，所以，我们还无法把它作为巴蜀书法的起源。不过，从 1980 年发现的四川青川木牍来看，它是公元前 309 年的战国文字书写墨迹，是目前被视为年代最早的古隶书的标本，加之青川地属四川盆地边沿，所以，成都平原的书法历史大约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到了汉代，无论从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还是从典籍文献记载来看，成都的书法艺术都有了很多实证。

据资料记载，成都地区出土的最早的书法碑刻当为都江堰境内的《蚕崖碑》，该碑为西汉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 2 年）所刻隶书石碑，现此碑已不存在，但据宋人洪适《隶续》一书记载和摹写，它是由篆书向隶书过渡时期的古隶书，已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而于 1980 年 6 月在成都金牛区圣灯乡猛追村（今属市中心）发现的成都汉阙刻石，刻于东汉永元九年（98 年），分为甲、乙两块，阙上铭文达 120 余字，是全国所发现的汉阙中铭文最长者。其书法与流传甚广的汉隶名品《石门颂》（148 年刻）风格类似，它可以证明成都地区的书法水平并不落后于当时全国中心地区的水平。该阙刻石现存于成都市博物馆。（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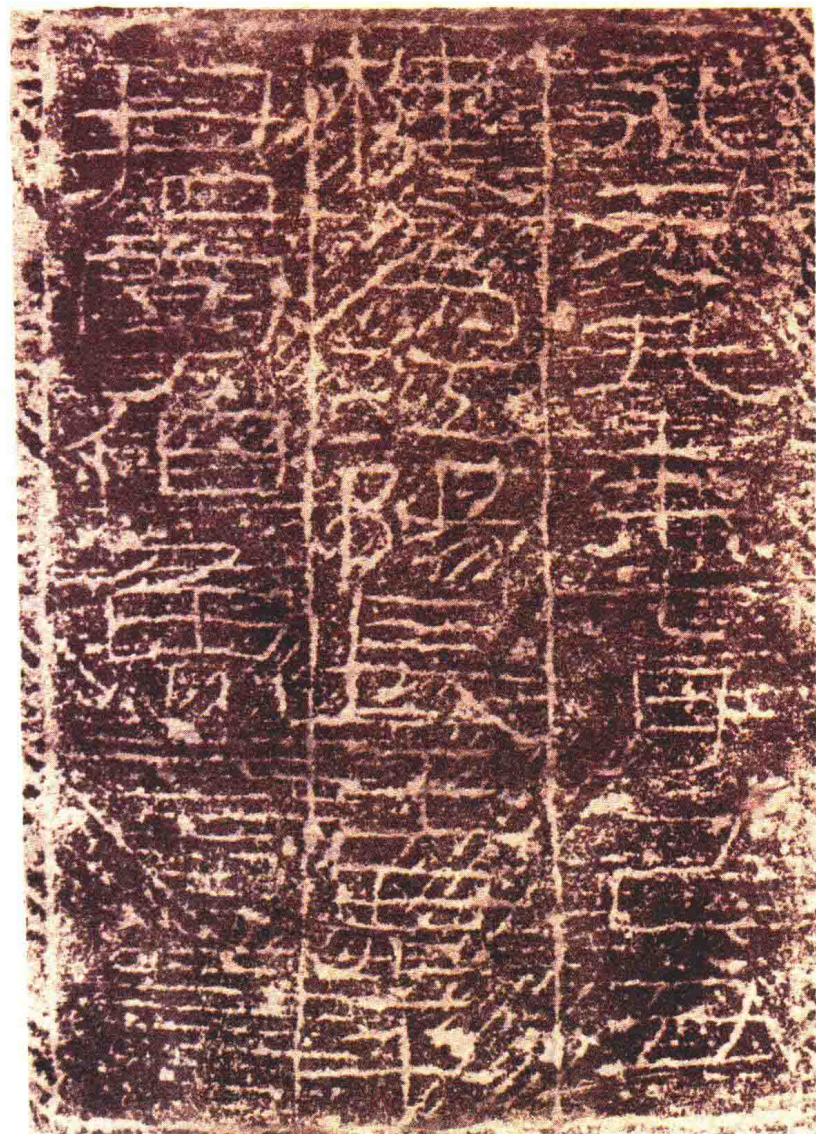


图 1-1 成都汉罽甲罽刻石

第三块值得一说的是 1966 年出土于郫县犀浦（原成都市西郊）二门桥的两通东汉残碑（刻于公元 129 年）。一名《王孝渊碑》，一名《薄书碑》。前者有隶书碑文 13 行，虽大部分剥蚀，但首尾几行字尚可辨认。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成都出土较早的东汉隶书石碑。近年来，许多书法研究者及有关著述曾谈及此碑，认为它是汉代四川地区书法艺术的见证和代表。（图 1-2）

2010 年 11 月出土于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口的两块汉碑《裴君碑》和《李君碑》当数成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碑刻作品。两者一大一小，同时被挖掘出土。大者为《裴君碑》，高 2.61 米，宽 1.24 米，有 1400 多字；小者为《李君碑》，高 2.37 米，宽 1.1 米，有 800 多字。两碑保存完好，碑铭字口清晰，分别记载了东汉时期裴君和李君的人生事迹。根据专家考证，裴君与李君均是东汉阳嘉年间的蜀郡太守。其中李君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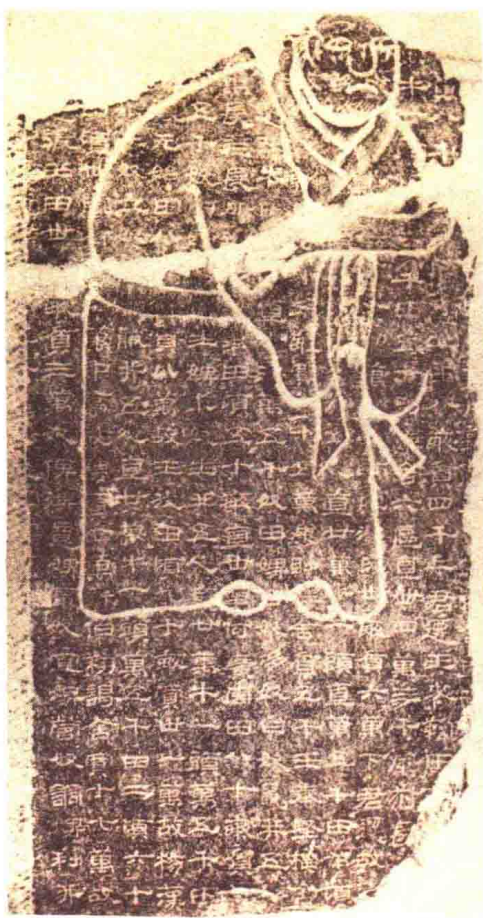


图 1-2 东汉残碑《薄书碑》

132—135年任蜀郡太守，他在任上“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裴君继其后，于144—152年在成都任太守。两人在治蜀期间重视教育，振兴儒学，使蜀郡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大力发展，人们为记其功德而立此两碑，并树立于当时的文翁石室（成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学堂）校区（即今日天府广场一带），因此，这两块碑既是成都历史上兴文重教、文化传承有序的最好见证，也为记载和歌颂地方官吏兴文重教之政绩的载体，其书法水平也堪称当时最恰当的代表。这两块碑文为典型的汉隶风格，章法朴茂，结字方整而灵动变化，笔力遒劲厚重。其中《裴君碑》更为率意古雅，有稚拙之趣；《李君碑》则稍扁平开张，有飘逸奔放之态。虽然两碑镌刻时间相差不久但却有较大的风格差别，这也显示了汉代成都地区书碑者的不同风格取向，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图1-3、图1-4）



图 1-3 东汉《裴君碑》



图 1-4 东汉《李君碑》

李冰修建都江堰是成都历史上举世闻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它使成都平原风调雨顺，并泽被百姓数千年。1974年3月，在都江堰鱼嘴附近出土了雕刻于东汉时期（168）的李冰石像（图1-5）。石像两边有三行铭文，共38字，其字大小错落有致，笔画圆润而有变化，结体端正而又有欹侧稚拙之趣。石像既有较高的雕刻价值和历史学术价值，也有较高的书法价值。

根据四川省文物志编辑部所藏拓片拍摄的出土于成都双流华阳半边街崖墓内的《杨子與崖墓题记》（图1-6）（原题刻已毁），所能见到的只有9字“蓝田令杨子與所处穴”。其字笔画圆转细瘦，奔放挺括，潇洒而不失遒劲，以篆书为基调，又略带隶书韵味；既有婉转之美，也有飘逸之态，无疑展现了汉代成都地区隶书的灵秀之美。

从留存于成都新都文管所的拓片《新都读碑图》考释，东汉和帝时在新都弥牟镇



图1-5 李冰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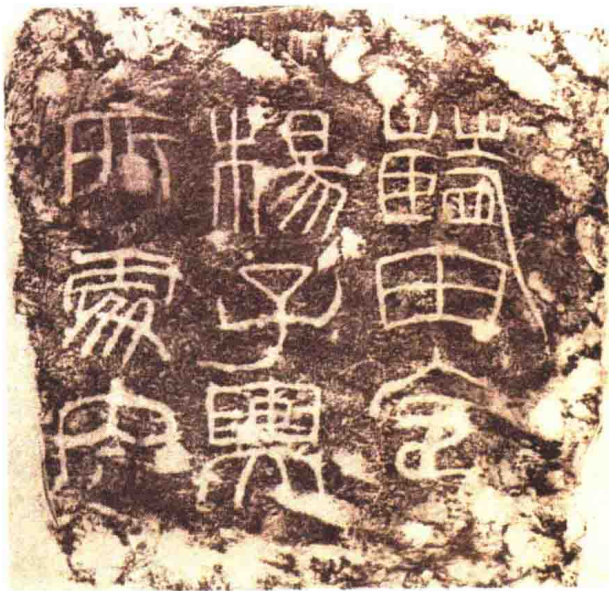


图1-6 杨子與崖墓题记

曾有《王稚子阙》(图1-7),上刻“汉故褒州刺史雒阳令王君稚子之阙”,该阙文流传有序。明代杨升庵曾有诗赞曰:“墓道邠原上,石阙巍嵯峨;左右三十字,照耀锦苔窠;八分隼尾隶,千载耿不磨。”清人王懿荣、顾复初、冯廉、张瑞珍等人先后用楷、隶、行草等体题诗,后人又刻成《新都读碑图》以赞之。可见《王稚子阙》的影响和其流传之有序,这也是成都书法史上一件非常有价值的轶事。

1980年郫县太平乡出土了东汉残墓的墓门,其上刻有一辎车,一车驾一马,车马下部为铭文,13行,每行4字,隶书阴刻,此幅隶书铭文温润厚重而有稚趣,展示了成都汉碑书法的又一种面貌。石刻遗迹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院。(图1-8)



图1-7 东汉《王稚子阙》



图1-8 郫县石棺铭文

现藏于成都龙泉驿区石佛寺的《北周文王碑》是成都书法史上又一重要遗迹（图 1-9）。该碑坐落在一块巨石上，为在岩壁上所进行的刻碑，碑额正书阳文，碑文为楷书阴文，上有飞天、佛像，碑文下方左右有佛像。此碑为南北朝时期北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于北周闵帝初元（557）为文王建佛道像而镌刻的碑铭。碑文对北周的开拓者宇文泰东征西讨、南北转战情景作了叙述，对于平息悦叛的经过等记述详细。其字体是典型的魏碑风格，方整峻峭，端严又不失温润，并带有唐楷意味，呈现出过渡时期的书法特征，具有较高的历史学术价值和书法价值，也是研究南北朝时期成都书法概况的重要史料支撑。

唐代时期的成都书法，可以通过留存下来的青城山常道观中的《唐玄宗手敕碑》《武侯祠堂碑》、都江堰《灵岩石经》等遗迹得到考察。

立于青城山常道观的《唐玄宗手敕碑》（图 1-10）碑高 1.2 米，宽 69 厘米，碑的正文前题有“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书，常道观主甘道荣勒字及题、晋元吴光逵刊石”文字内容，其碑文近 200 字，楷书、行草书间杂，为破体书。其楷书秀润遒劲，行草书连绵流畅，书体间的过渡流畅自然，是一种少见的破体书法碑刻。

立于成都武侯祠大门内右侧的《蜀臣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图 1-11）为唐代元和四年（809）所建，由唐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以楷书书成，名匠鲁建刻字。其楷书温润秀美、含蓄蕴藉而多韵味，与乃兄柳公权书法有较大不同。因文章、书法、镌刻精湛，世称“三绝碑”。有人说是指诸葛亮的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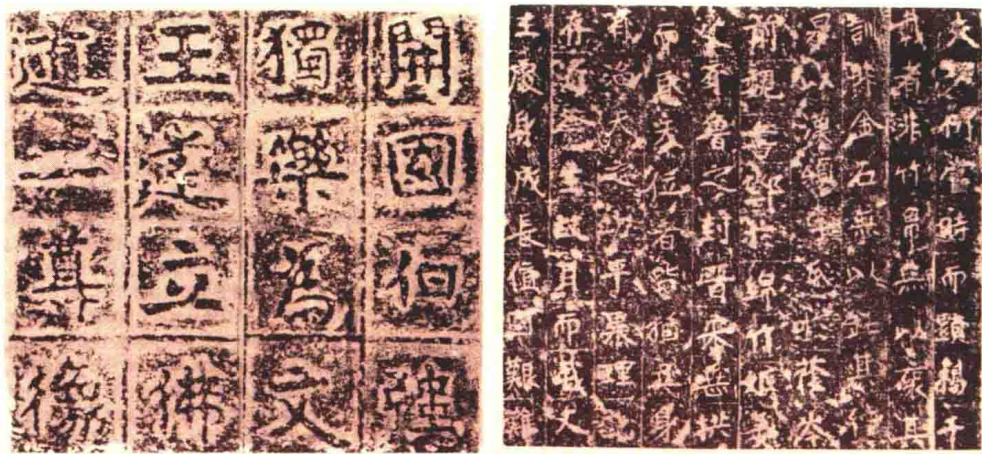


图 1-9 南北朝《北周文王碑》

图 1-10 青城山《唐玄宗手敕碑》



图 1-11 唐《蜀臣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绩、裴度文章和柳公绰的书法（未含镌刻）。所以后人还有将这两种说法合二为一，则又有“四绝”之称。不管哪种说法，都公认了这块碑所具有的很高的文物价值和书法价值。

五代两宋时期的成都书法，一方面由现存的碑刻遗迹、墓志书法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书法名家的作品留传于世，两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宋代成都书法的丰富性。

现存碑刻遗迹主要有《福庆长公主墓志铭》《孟蜀石经》等。1970年在成都北郊7公里磨盘山南麓的后蜀孟知祥墓中出土了《福庆长公主墓志铭》。孟知祥于五代时（934）自立为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其妻福庆长公主是晋王李克用的长女，葬于磨盘山，后与孟知祥墓合葬。该墓志铭文字内容长达1800字以上，记载了福庆长公主的生平事迹、德行及诗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而《孟蜀石经》（图1-12）则是后蜀主孟昶于广政元年（938）依唐文宗《开成石经》（国宝级文物，唐文宗主持，花费七年时间将经书刻成的114块石碑，837年完成，现藏于西安碑林）旧本刻石立于成都学官石经堂的一处工程浩大、很有书法意义的石刻，又称《广政石经》《成都石经》等。初由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其事。该碑为楷书，始刻经文有《孝经》《论语》《周易》等17卷，由张德钊、杨钧、张铭文等名书法家书丹和校订，陈德谦等刻石。其后宋皇祐元年（1049）、徽宗宣和年间都不断补刻，石经镌刻制作达180年之久，碑版上千，工程艰巨，但刻版却很精良。其严谨的体例和俊美的书法被后代书家誉为“专精”之作。其字体与唐《开成石经》相近，以欧阳询、虞世南风格的字体为主，书法秀整，较《开成石经》更优美。清代杨守敬曾评价：“蜀石经经注并刻，宏工巨制，可谓空前绝后。”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

另外，宋代有记载的成都籍文人书法家或曾在成都为官的文人书法家也有不少。如成都籍文人书法家梅挚、范祖禹、张商英、宇文虚中、魏了翁及画家贯休、石恪等。其中梅挚、范祖禹、张商英、魏了翁等人的书法作品在近年来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书籍《中国书法全集》中都有专门收入，在有关史料书籍中也多有记载。另外包括一些曾在成都为官的文人书法家如陆游、范成大等人，他们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均留下了较大影响。特别是陆游，其在成都为官多年，书法影响较大，他的书法作品中还有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怀成都诗卷》，这无论是对于成都文化还是成都的书法艺术历史来说都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图 1-12 五代《孟蜀石经》